

论“太平洋时代”

王逸舟

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政治变化万千、扑朔迷离，各种大的力量都在寻找新的支点，设计新的战略，在众多的议论中，有关“太平洋时代”的说法格外引人注目，它得到了人们普遍看好的事实和趋势的有力支持。《论“太平洋时代”》一文对这一说法作了比较全面和细致的考察，作者从基本概念溯源，考证了“文明重心西迁”的史实，着重分析了“太平洋纪元”出现的原因及意义，尤其是讨论了关于“太平洋时代”的几种设想及其背后隐藏的历史及政治文化背景之差异。

近些年来，有关“太平洋时代”的议论逐渐增加，不论国外国内，凡涉及冷战结束以后的世界走势的论者，或多或少总要提到这种论点。究竟何为“太平洋时代”？它的区域范围有多大、时间持续有多长？是否可能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盛世景象？起反作用的因素有哪些、有多严重？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一地区各主要国家为应对新的机遇和挑战有何种设计？无疑，像这样一些问题已经并将继续引起越来越大的关注。本文试图探讨和回答若干在笔者看来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它兼有考察和论述两类性质，即：既要考察各种对“太平洋时代”的论说，也将阐发笔者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思索。贯穿论文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太平洋时代”之说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命题，它同时需要理论家的深入研究和政治决策者的高度重视。

结构上看，全文共有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界定有关太平洋文明的各种地域概念，为总体的讨论划出范围。第二部分进入主题，近现代史上文明重心的不断西迁乃这一部分议论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专门研讨“太平洋时代”取代“大西洋时代”的问题。第四部分分析关于“太平洋时代”的几种设想，即美国的蝴蝶模式、日本的雁阵模式、马来西亚的项链模式和中国的扇形模式。第五部分观察亚太地区存在的广泛而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差异，并研究这些差异对即将到来的太平洋纪元的正反两方面的现实和潜在影响。

一、从地理概念说起

关于国际形势中我们将要讨论的那种新的变化，尽管方向大体一致，人们采用的具体表述相当混乱且内涵不一，如：“太平洋文明”，“亚太时代”，“亚洲纪元”，“东方复兴”，“东亚景气”，……等等。凡此种种，有心人可以归纳出上 10 个。其余的姑且不论，让我们对已经提到的概念作一番简单的疏理工作。¹

所谓“方向一致”，是指论者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在 20 世纪即将终结的今天，世界发展的重心已从地球东经 0 度西经 0 度左右为中心的区域转至东经 180 度西经 180 度左右为中心的区域。换句话说讲，当人们提及上述概念时，他们的心象已含有对诸如“大西洋文明”，“美大时代”，“欧洲纪元”，“西方复兴”，“不列颠帝国盛世”等观念的拒绝和否定。

然而，在承认重心转移的前提下，各人各家的立场、角度和出发点却大相径庭，首先在地理范围上就不一样；任何说法基本上都不是纯粹的自然地理概念，而是一般地理知识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观念相结合的产物。

“东亚景气”，指的是亚洲东部（东经 100 度至 130 度、北纬 0 度至 40 度左右）一带近一、二十年发生的经济迅速增长的繁荣景象。所谓“东亚”，又有“小东亚”和“大东亚”之别：“小东亚”限于东北亚一线，即从朝鲜半岛到台湾、香港及中国大陆沿海再到赤道附近的新加坡这样一条范围细窄狭长的区域。“大东亚”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两部分政治地理区域，即除了“四小虎”之外，还有日本群岛、中国大陆、印度支那和泰马印尼及菲律宾等国。粗略估算一下，大东亚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 1/3，经济总产值约占世界经济产值的 1/5，面积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 1/10 弱。在过去的 1/4 个世纪左右的时间中，东亚（无论狭义广义）已萌生出一种被世人看好的新的发展模式，成为后发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赶超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典范。

“东方复兴”之说具有特别浓厚的文化和政治意念色彩，它指的是自近代世界体系产生后一直占据支配地位的西方中心地位的终结和代之而起的东方文明（同时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兴盛。这里的“西方”或“东方”，更主要是一种政治地理的分野：西方包括了至今仍充当世界霸主的欧美日诸发达国家，重心在大西洋一带；东方则指新近快速成长起来的以亚洲东部为重心的发展中地区（甚至有时把印度算入），日本虽然地理上位居亚洲最东部，却未被视作“东方”的一员。按这种理解，“东方”人口接近世界总人口的一半，面积约为地球陆地总面积的 1/8，产值不到世界经济总产值的 1/20。尽管承认离西方尚有不小差距，这种观点最看重的乃东方之文化特质的优势和未来一些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

¹ 凡文章中涉及自然地理处，资料来源如下所述：吉林大学等院校地理系编《世界自然地理》（上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0 年 4 月版；地图出版社编制《知识青年地图册》，地图出版社 1975 年 7 月版；尚范理著《太平洋》，商务印书馆 1977 年 1 月版；《各国概况》（1979 年版），世界知识出版社 1979 年 10 月版。

“亚洲纪元”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说法，它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前进和日本国内有关“脱欧入亚”或“脱美入亚”的呼声高涨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像前两种提法一样，自然地理同政治地理在这里是不完全吻合的：自然地理上的亚洲位于东半球的东北部，包含了俄罗斯的很大一片领土，全洲东濒太平洋，南临印度洋，北滨北冰洋，西靠地中海和黑海，约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30%，人口占了全世界人口55%以上，无论面积或人口均为世界第一大洲；而“亚洲纪元”所指的亚洲，不包括西亚、中亚和俄罗斯的远东部分，范围仅限于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一带，与前面提到过的“大东亚”相比，多了印度和次大陆的其他国家。这一块区域面积不超过地理亚洲的1/3，人口占了世界总人口一半，是地球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产值占总产值的1/4左右。

“亚太时代”是80年代以来问世的新设想，也是最有争议的命题之一。批评者的主要论点之一，是说你低估了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潜力和欧洲作为一个整体重新称雄世界的实力。另一个不赞成这种提法的重要理由，是它在表述上的歧义性和含糊性。显然，即便在赞成这一命题的不同国家那里，对于如何推动这一时代早日实现的问题也说法各异（后面将专门分析其中若干主要的设计），甚至连概念的地域界线亦各不相同：在主要论见中，有的强调立足东亚，“以我为主”，拓展与太平洋沿岸国家的联系（所谓“亚洲的太平洋”就有这样的意思）；有的主张大东亚地区加上大洋洲的国家（主要是澳大利亚），形成“亚洲-大洋洲经济合作区”或“东亚经济共同体”；有的瞄准太平洋东西两岸，主要是美国与亚洲东部国家的现实和长远联系，要求建立以大国强国为中轴和龙头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区。我们不妨给它们分别冠以“小亚太”、“中亚太”和“大亚太”的称谓。从面积和人口及产值看，“小亚太”几乎与“大东亚”等同；“中亚太”区域面积相当可观（主要是由于大洋洲地域辽阔），澳新两国虽然人口相对稀少，但国民经济已达到发达国家一般水准，它们与人口稠密、经济相对落后的多数东亚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地区）之间经济互补的潜力极大。“大亚太”观念对于大洋两岸的大国特别有吸引力，因为只有大国才有能力联系和动员广泛领域内的各国家资源，也只有它们才有可能更充分地享受这种巨大的战略疆域给它们带来的好处和利益。由于加上了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大亚太”一下成了世界主要经济区域：它拥有地球2/5以上的陆地面积，一半左右的人口和2/3强的产值。

“太平洋文明”与“大亚太”概念有某种重合之处，但前者更宽泛更宏观也更强调世界第一大洋的中心位置；单就经济而言，这方面亦能见到“太平洋区域共同体”、“环太平洋经济圈”或“太平洋盆地经济区”的类似说法。从地理上看，太平洋位于亚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和南极洲之间，其面积占地球表面总面积的1/3强，是世界上最大最深的海洋，它的容积有7亿立方公里，水量几乎占地球上全部水量的一半。太平洋的渔业生产在世界各大洋中居首位，约占世界海洋捕鱼总量的一半以上；大洋海底蕴藏了世界上最大储量的石油、天然气和其他矿产资源；联系各大洲的许多重要海、空航线都要通过太平洋，东部的巴拿马运河和西南部的马六甲海峡，属于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战略通道之列。这一地区共有30多个国家，集结了当今世界人类总数的一半以上和人类创造的生产力的一大半。濒临这一区域的，有世界上一亿人口以上的10个国家中的8个，有世界上军事力量最强大的10个国家中的7个，有世界上经济产值最高的10个国家中的5个，有世界上最

有影响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安理会——的5大常任理事国中的3个。太平洋也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种类最多差异最大的一个区域（后面将对此作专门讨论）。所谓“太平洋文明”，是相对于“大西洋文明”、“地中海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爱琴海文明”等从前曾经辉煌、对世界史有重大影响的文明而言的。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世界发展的重心在不断西迁，现在好运已转到了世界第一大洋；新的世界文明中心将由太平洋的新兴大国（或者美国？）体现。至于新的大船应不应有掌舵人，由谁来掌舵、停泊点在彼岸还是此岸，则谈不上一致意见。

二、西迁中的文明重心

“人类福祉从不久停一方”，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这样写道。如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察觉的那样，^①直到目前为止，世界文明的重心一直在不断地西迁，像永恒的物理运动那样从来不永远固定于一个点（国家或地区）之上。人类进入近代以来，这种变迁的方向和过程尤其显得清晰有力。所谓“太平洋文明”或“太平洋时代”的论点，首先建立在这种考虑之上。

众所周知，古代印度和中国曾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人类文化，为文明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传播渠道的不畅，更由于这两个中央王国自成一统、闭关自守的特征，它们基本上算不上“侵略型”、向外发散性的文明。因此，人们观察文明重心的西迁时，一般从欧亚非三大陆交接的近东和小亚细亚地区开始。发祥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及两河流域的文明先是在埃及、土耳其一带结出硕果，形成那个时代世界上比较发达的文明区带。古埃及的图形文字、建筑、数学和天文知识，爱琴海区域的壁画、陶器彩画和金银工艺品，代表了当时各国文化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例如，埃及第四王朝的大金字塔直到19世纪巴黎埃菲尔铁塔建成以前还是世界最高的建筑，被誉为古代世界的奇观；古代埃及的天文历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太阳历，后来罗马的朱里亚历便是根据它修订的。

经过若干世纪的西进，公元前5至4世纪时，文明中心转到希腊，之后（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再到罗马，形成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的欧洲古典文明（包括文学、艺术、雕刻、哲学、科学等）。希腊文化在公元前6世纪已有相当发展，至公元前5—4世纪臻于极盛；就商业贸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言，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可以说已达到古代城邦制经济的高峰。恩格斯在评价古希腊人的成就时指出：“……他们的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保证了他们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要求的地位。”^②稍后的罗马帝国在将近200年时间内中维持了比较稳定的统治，在广大疆域（范围涉及整个地中海区域）内形成所谓“罗马和平”的“黄金时代”。古罗马的政治经济制度、贸易金融地位、科学艺术和史学，像古代希腊一样，成为欧洲后世发展的持续长久的楷模。

^①例如，可参阅飞冈健文章：“亚洲是21世纪的主角”，《编译参考》1993年第6期。

^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6页。

经过中世纪的漫长岁月，至14—15世纪，文明世界的重心定位于今日意大利全境，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手工业和呢绒行业，尤其是威尼斯的丝织业、玻璃制造业、造船业、商船队、商业活动，闻名遐迩、称雄欧洲；威尼斯的金币“杜卡特”几乎成了全欧通用的货币；威尼斯拥有商船三千，在舰队中服役的人员达三万之众。全盛期的威尼斯，其领土包括波河下游、达尔马提亚、希腊南部、优卑亚岛和克里特岛。这个富庶的地中海商业共和国，通过贸易、征战、文化传播，使自己的生产和交往方式成为当时欧洲有典型意义的进步方式；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在14世纪15世纪，已经稀疏地可以在地中海沿岸的若干城市看到”。^①

16世纪近代世界关注的焦点再度向西，传到西班牙和葡萄牙。尽管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并非属于欧洲最先进行列，然而在那一时期欧洲最重要的国家活动——航海探索——中，这两个国家却扮演了主要角色。最先探寻绕过非洲通往印度航路的是葡萄牙人，达·伽马于1498年发现这条新航线；另一位葡萄牙人麦哲伦于1522年完成环球航行。西班牙航海家哥伦布则成为第一个航抵美洲的欧洲人。15世纪末已完成国内政治统一和中央集权的西葡两国，在开辟新航路的冒险中成为世界第一批殖民国家，并推动了封建时代朝资本主义时代的转变。像现代最伟大的批判思想家指出的那样，“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②

17世纪前后，文明焦点转向西北，传到荷兰、法国。那一世纪前期的荷兰，造船业居世界之首，商船吨数占欧洲总吨数的3/4，各殖民地的产品多半通过荷兰转运西方各国，进入波罗的海的船舶的70%属于荷兰人，故荷兰有“海上马车夫”之称；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贸易和信贷事业的中心，1609年创办的阿姆斯特丹银行是欧洲最早的资本主义性质的银行；1575年创立的荷兰莱顿大学，是欧洲第一所新教大学，17世纪前期是荷兰文化的兴盛时期。而路易十四（1643—1715年）时期法国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使这个国家成为当时欧洲、亦是全世界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百科全书派等）对全欧乃至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宪政制度的建立起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尔后，到了18、19世纪，文明重心再度西进，穿过多佛尔海峡进入英国，大不列颠帝国的世界王位开始确立。“七年战争”（1756—1763年）后，法国遭到惨败，英国确立了海上霸权，一跃成为欧洲头号强国。首先出现工业革命的英国，在18世纪中后叶已拥有欧洲最先进的手工工场和机器制造业，19世纪时英国工业生产占据了世界第一位，有“世界工场”之称，当时英国及其殖民地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超过法、德、美三国的总和，英国的商船和舰队在各大洋称王称霸，“日不落帝国”的国旗炫耀于世界各个角落。恰如列宁指出的那样：“从19世纪中叶起，英国至少就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征：（1）拥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0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24页。

有极广大的殖民地；(2) 拥有垄断利润（因为它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①

然而文明重心并没有停止变换，英国的霸权终于让位给新的超级大国：20世纪前后，世界中心移至大西洋另一岸的美利坚合众国，其霸主地位至今已持续了近一个世纪；1860年时美国工业生产还位于世界第四位，到1894年已跃居第一位，其生产量约为欧洲各国生产总量的一半左右，小麦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近1/4。20世纪前半叶更是美国发展的“黄金时代”，1913年工业生产超过英、法、德、日四国的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本世纪中叶的若干年是美国的鼎盛期，例如，1948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和出口贸易在资本主义世界分别占54%和1/3，黄金储备占74%。至今，美国的钢铁业、建筑业、汽车业、飞机制造业和宇航工业、军火工业、化工工业以及银行金融业仍执世界之牛耳。^②

不过，就是在整个20世纪里，美洲大陆的发展重心也是从东海岸逐渐朝西海岸迁移，“美国的欧洲时期”不知不觉地变成了“美国的亚洲时期”。在临近21世纪的时候，许多人都认为，世界经济的重心已经移向了太平洋西岸；倒回几十年前根本无法想象的“美国衰落说”，竟然也越来越多地成为欧美一些报章的头版标题。近500年来大西洋沿岸国家操纵世界体系、控制世界科学文化和政治经济走向的强势已渐趋衰微，全球中心显而易见地正在移向太平洋-亚洲区域。一种相反的看法则坚持说，美国正面临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机会，即在亚太地区扮演一个关键性的和胜利者角色。无论哪种看法，都证明文明中心一如既往地仍在西迁之中。

最后再分析一下为什么文明中心会不停转移并且向西转移的问题。

关于文明兴衰的规律，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鸿篇巨制《历史研究》中对此曾经有过深入讨论（尽管他所讲的20余种文明与我们所讲的中心文明概念不太一样），我认为他的所谓“挑战-应战”模式可以部分地吸收过来用于解说变迁问题。简单地说，文明的生死过程是一种不断进行的“挑战与应战”：特定的环境向一个社会（或一种制度）不断地发出挑战，而这个社会（或制度）则通过它的少数创造性的个人对于这个挑战进行成功的应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使特定的文明达到鼎盛阶段；一个处在生长阶段的文明对于不断出现的新挑战能够予以胜利的应战（不管利用哪些手段和在多长的时期内），而一个处于解体阶段的文明则不再能对于挑战进行这样的应战。文明的生长说明这个文明有某种“日益增强和日益积累的内在自决能力或自我表现能力”，相反，文明的衰败说明这个文明上述能力的下降。在我们前面提到的各种曾经充当世界生长中心的文明里，每一次被取代的文明（国家）都是由于在新的条件下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地理开拓的或经济发展的或军事扩张的或技术进步的或加强联盟的要求等等）而衰败，取而代之的文明则正由于抓住机会、因势利导而壮大自己、跃居上位。社会是进步的，环境是变化的，文明中心（核心国家）因而必然此一处也、彼一处也，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第110页。

^② 关于世界历史上文明变迁和各种主要文明的发生及其影响，可参阅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中古部分、近代部分（上下册）共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和1973年版；【英国】汤因比著：《历史研究》，上中下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至于为何文明重心是向西移动，笔者尚无法给出确凿的理由。这或许只是一个既定的历史事实，一种由先前的各种条件所决定但不一定在未来继续循环往复的态势。关于早期情况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人类文明最初的发祥地是西亚的两河流域、北非的埃及、还有印度和中国等，这些文明种类在衰落阶段上或由于自我封闭的原因（比如中央帝国拒绝与外部交往）而不能向外发展，或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比如高山大洋阻隔）而不能向东发展，或由于气候方面的问题（比如冬季寒冷漫长）而不能朝北方发展，最终比较具备扩散特征的一些文明不自觉地选择了西进的方向，被西部的较新的但更具有扩张性的文明种类取代。从这个意义讲，历史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与此相关的另一种解释，涉及到历史机遇问题：人类进入近代以后，与古代情形相反，技术进步成为决定文明中心在哪里出现的关键，因此充当主角的总是技术比较先进的临海国家，而且发展的趋势总是从比较小的水域朝更宽广的水域演进，先是地中海的威尼斯，后有大西洋的英国，今天则见到了太平洋的美国（照此推论下去，未来的中心应当具有开拓“高边疆”的能力，即具备海空一体、综合开发以至向外宇宙拓展的素质）。可以作为佐证的一个事实是，科学技术在近现代是以加速度发展的，它同“霸权”周期的缩短幅度恰好一致。单从球面地理的角度看，我们不能十分肯定地作出文明中心将继续向西移动或移向某个国家的结论。

三、由大西洋时代到太平洋时代

世界发展“重力场”由大西洋文明向太平洋文明的转移，是当代经历的事件。

美国发展重心之由东向西的变动，首先同欧洲的衰败密切相关。如前所述，从人类文明史看，特别是从进入世界体系时代（其标志可用哥伦布500年前首航美洲、将东西半球事实上连接在一起的划时代事件加以表示）的近现代文明看，主宰世界的中心文明均位于欧洲（我们已辨识了其中5至6种），作为一个整体的大西洋文明成为现代史的枢纽。这种文明对于全世界的优势地位，一直到本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止，的确是空前的。所谓“空前”，也就是说，虽然在大西洋文明以前许多其他的文明已经在远离故土的地方发生了影响，但没有一个文明曾把其影响扩展到全球。^①美国的崛起和美国的欧洲时代实际上也是大西洋文明的自然延伸。美国的大多数人口是欧洲人的后裔，美国的物质资源的开发不仅依靠欧洲劳力的输入，而且依靠欧洲物质的进口和欧洲服务的利用；欧洲发明的工业体系在美国发展到新的规模和强度，并生成更尖端更有力的支系；合众国奠基者（如潘恩、杰弗逊、亚当斯等）的抱负和使命感受到欧洲启蒙运动的直接激励，亦是后者的再创造和升华。在欧洲文明达到支配全世界的鼎盛阶段，恰恰是美国文明上升最快的时期。

正因为存在这样一种内在的联系，欧洲的衰微过程也意味着美国成长动力的某种减弱和发展朝向及重心的某种改变。有专门的研究者指出，在欧洲大陆，部分地由于其封建历史的影响，民主一般趋向于“无条件的集中”，即国家以“权利和公共福利的唯一监护人”的形象出现。工党、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政府对“无控制的”经济变化抱有更多的猜疑，希

^① 汤因比：《文明经受了考验》，第8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望建立以国有工业为基础的广泛的国家福利制度。欧洲发展了一种强烈依靠政府吸收经济财富的方式，其程度是美国或多数亚洲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可比拟的。在一般欧洲人的眼中，福利国家建设比任何东西都更能使他们保护好他们的民主制度，多数人对政府的依赖甚于他们对经济自组织能力的信任。不计入劳动成本的停产时间、严格的工作小时规定、工作安全保证、社会保障等等，使欧洲整体的劳动成本上升和竞争力下降。欧洲的小型公司和个体经营通常是相对保守的、独家经营的而且领域狭窄的，它不是能够创造新职位和鼓励技术革新的进取性单元。欧洲的工业政策——用批评者的话讲——是“熔庞大联合计划、巨额政府资助和保护措施为一体的大杂烩”^①。这一切以及其他一些问题造成了比较保守和技术上相对落后的局面，加上由于欧洲人对外来移民那种总的来说不太欢迎的态度所造成的欧洲人口下降的趋势，欧洲大陆出现了一种被称作“欧洲综合症”或“英国病”之类的衰落景观，比如人口结构老化、工业投资水平停滞不前、失业率的上升、技术革新势头疲软、消费和生产之增长幅度的下降、技术领先地位的丧失等等。

看出了欧洲的衰败景象，美国不知不觉地使自己的重心开始发生微妙的改变。曾几何时，这个“新大陆国家”还差不多是欧洲中心主义者的一统天下。例如，二战期间，美国太平洋战区指挥官麦克阿瑟将军对陆军部的“北大西洋孤立主义”抱怨不止：西南太平洋战区占伤亡人员的1/3以上，却只得到美国总军费的不到15%。1945年至1952年，美国给联邦德国的纯外援达到37亿美元，远远超过提供给人较多的日本的21亿美元。从整体上说，欧洲得到的援助几乎是给亚洲的援助的4倍。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的20年内，美国公司主要是经营欧洲市场。到1966年，美国厂商在欧洲的投资额超过160亿美元，同期美国在横跨日本、东南亚和印度的广大亚太区域内的投资才42亿美元。美国文化欧洲化的倾向，学术界、艺术界和科学界体现得最明显（无论是内容构成还是领导成员）。美国的自我形象同欧洲文化相结合，加上长时期对苏俄的恐惧心理，使美国自觉不自觉地使自己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直到现在，也不能简单地认为美国人已经觉得欧洲不再重要或相对于亚洲不那么重要了。许多美国当权者和企业人士的举动依然如故，似乎世界经济和政治依旧听命于盎格鲁-美国人、欧洲人和白种人；多数美国人可能发现他们集中在国内和较熟悉的欧洲市场从事贸易活动更为驾轻就熟，心态、习惯和语言都更为同一。^②尽管苏联已经消失，美国人认为俄国仍然是唯一有力量在未来对美国构成挑战和真正威胁的国家，美国在大西洋的战略利益仍然是美国最重大的利益之一。

但是，细细观测一下，不难觉察老地方出现的新态势：1960年，美国跟亚洲的贸易与它同欧洲的贸易比起来要少一半。1970年到1985年间，美国对欧洲大陆国家的贸易出口额下降了12%左右。1980年，美国同太平洋彼岸的贸易额已与美国同大西洋彼岸的贸易额相等。到1989年，美国同太平洋西岸的贸易额达三千多亿美元，比美国同大西洋对岸的贸易额多37%。据美国传统基金会公布的数字，1992年，美国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① 乔尔·科特金和岸本和子著：《第三世纪——美国在亚洲纪元的复兴》，第79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② 这方面的具体事例，可参见《第三世纪——美国在亚洲纪元的复兴》一书中的大量描述。

成员的双向贸易额达 5340 亿美元，其中同东亚的贸易额达 3480 亿美元，远远超过美国同加拿大加上墨西哥 2650 亿美元以及美国同欧洲 2270 亿美元的贸易额。现在美国对亚洲头号经济强国日本的出口比对西欧前三强德国、法国、意大利的出口总和还多；对韩国的出口超过对法国的出口，对台湾的出口超过对意大利和瑞典出口之和。^①美国社会本身也在经历一个类似的非欧洲化过程。今天，太平洋沿岸国家是美国新的合法及非法的移民的最主要的来源；在新来者中，每十个人中最多才有一个是欧洲人。美国的“阳光地带”——西部和西南部，尤其是加利福利亚州和太平洋沿岸地区——成为美国最有希望、最兴旺发达的经济区带。美国的权势集团的构成也在近一、二十年内发生了比较有利于西部权势集团而非传统的东部权势集团的改变。美国文化和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对由于太平洋彼岸造成的新的危机、新的观念、新的社团、新的准则的困惑和探讨。从 70 年代中期起，美国官方开始强调美国的“太平洋属性”，把美国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联系摆到了比过去更重要的日程上。1979 年 4 月，当时的国务卿基辛格在一次会议上就提出了“世界的重点逐渐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地区”的论点。克林顿总统 1993 年 7 月在日本发表演讲时说道：“我认为，太平洋地区能够并将成为我们美国人民的一个就业、收入、合作、思想和经济增长的巨大来源。”^②克里斯托弗国务卿 1994 年 2 月 24 日在美国参议院外委会谈到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时更明确地指出：“本届政府对外政策的一个明显标志是重新强调在亚太地区推动我们的利益。对我们（美国）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地区比这个地区更加重要”。^③

正像“美国的欧洲时代”同大西洋东岸的命运密不可分一样，“美国的亚洲时代”的到来与太平洋西岸的经济状况息息相关。今天的亚太地区代表了新的、上升中的经济力量的主要生长点，由于这个地区近几十年来一直保持了世界上最高的经济增长率，自 60 年代以来，它在国际经济中的比重扩大了三倍。30 年前，东部亚洲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一半、西欧的 1/3，而今已占到美国的 70% 和欧共体的 2/3。全球的外汇储备有 1/3 集中在亚洲；1980 年，世界上最大的 20 个出口国（及地区）中亚洲仅占 4 个，而 1991 年已达 9 个。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东亚集中了全世界各种类型国家中发展最快的事例：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发展最快的国家，“四小”是发展中国家中发展最快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及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发展最快的国家。1960 年时日本的 GNP（国民生产总值）低于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到 1986 年它却是联邦德国的两倍，比英法两国的总和还多 30%。80 年代中期，日本控制了国际银行业资产的 1/4，略高于美国，几乎是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银行储存量的 3 倍。1980 年时全球 10 大银行中仅 1 家是日本银行，1989 年日本却占了 8 家。80 年代里，美国沦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日本成了最大的债权国。1988 年，日本在国外的投资超过美国，其海外投资累计已超过英国，仅次于美

①有关数据，可参见李长久：“东亚崛起与亚太新世纪”，《世界发展研究》总第 47 期；陆亨俊：“亚洲的挑战和中国的机遇”，《世界发展研究》总第 34 期；《第三世纪——美国在亚洲纪元的复兴》，第 2 页。

②李长久文，第 12 页。

③美国新闻署华盛顿 1994 年 2 月 24 日电。

国。不管是钢、家用电器的生产，或是工业实用机器人的生产，日本都名列前茅。^①尽管日本经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它的地位也不断受到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的挑战。继“四小龙”之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开始了高速增长的过程，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群之一。这七个国家（及地区）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如果把美国、德国、日本和七国（及地区）的实际国内总产值之和算作100，1965至1989年，美国的比重从65降到55，德国从19下降到15，日本从14上升到24，而七国（及地区）更从2上到6，增长幅度最快。由于经济总量迅速扩大，七国（及地区）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如果把它们与美国、德国、日本的进口总额之和作为100，1965至1989年，美国的比重从41降至39，德国从34降到22，日本从14上升到16，而七国（及地区）从10上升到23，增幅又居首位。而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出口总额已与美、德、日并驾齐驱。如果把美、德、日和七国（及地区）出口额之和作为100，1965至1989年，美国的比重从42下降为25，德国从37降为29，日本从17升至24，七国（及地区）则从4上升到21。^②我们亲身所处的也最熟悉的中国在80年代的崛起，则是经济史上最有意义的现象：从70年代末起，占世界人口1/5以上的这个东方大国，通过自身的改革开放，焕发出史无前例的活力，以平均年递增10%左右的速度，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增长。与奇迹般的经济增长相联系，东亚文化的潜质，它（们）与市场经济结合后可能生成的巨大能量、“儒家资本主义”或日本式“集体资本主义”等等引起世人愈来愈多的兴趣和研究。这样一些“东方的”或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被看作新的起飞时代的精神支柱的重要内容，例如，有人认为，在越来越小、越来越有限的地球上，希伯莱宗教和古希腊人文主义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因为希伯莱教那种认为“世上只有一个神在统治一切”的宗教信仰无法适应“共存”的需要，惟有经过基督教和佛教、儒教的融合产生的思想才可能保证多样性的存在和发扬光大^③；再比如，儒家注重天人合一的思想可能对21世纪各工业发达国家产生巨大影响，即更多地注意人和自然之间的协调；儒家的管理思想可能更多地为经济界所重视借用，像“《论语》加算盘之类”；儒家道德可能对调节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各种人际关系发挥积极作用，如勤俭朴素、刻苦耐劳、自省慎独、敬业乐群等。^④一位中国著名学者预测，古老的中国哲学所教导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道理，在全球化的时代将更加显示其常新的价值。^⑤

不论讲“美国的亚洲时代”，或者说东亚国家的“太平洋世纪”，世界发展的重心都已从大西洋转移到了太平洋。

^① 陆亨俊文，第1-3页；《第三世纪——美国在亚洲纪元的复兴》，第2-3页。

^② 李亚芬：“面向21世纪的亚洲具有活力的经济实体”，《现代国际关系》1992年第3期。

^③ 飞冈健，前引文。

^④ 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文章，例如可参见李慎之“辨同异，合东西”一文，《厂长经理报》1992年2月2日；蔡德贵：“儒学与21世纪”，《国际展望》1993年第2期，第13-14页。

^⑤ 李慎之：“迎接全球化时代——在北京纪念美洲发现五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四、对太平洋时代的不同构想

俗话说，“同床异梦”；又说，“同工异曲”。在承认太平洋时代已经或必将到来的前提下，太平洋沿岸各国出于不同利害考虑，对这个时代的内涵的理解和说明大相径庭。到目前为止，多数国家主要还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规划和解释本国在太平洋时代的利益、立场及出发点。本节介绍和分析其中最具有代表性、有典型意义的四种战略构想，即美国的“蝴蝶模式”、日本的“雁阵模式”、马来西亚的“项链模式”和中国的“扇形模式”。须说明的是，这四种构想（或“模式”）乃笔者以当事国的立场和声明为基础所作的主观概括，并非已有公议的说法。

1. 美国的“蝴蝶模式”^①

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实力地位决定了美国必然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手比别人伸得更长；其在新时期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所谓的“蝴蝶模式”战略：这只蝴蝶的头部在北美洲，美国本土是中枢神经系统，美加墨三国联手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为头的外延。身体躯干部分是中美洲和南美洲，未来的“全美洲自由贸易共同体”是美国在区域集团化时代抗衡日本和欧共体的基本依靠力量。然后，发育成熟的蛹体再生成翅膀，作“两翼齐飞”状；也就是说，一方面，“从文化渊源和思想感情角度而言”，更“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利益之需要考虑”，美国绝不放弃与欧洲的紧密联系，不可能想象出美国退出由它一手创建和控制的北大西洋公约和欧洲安全体系的情景（尤其当俄国还有可能把势力范围扩展到中欧和北欧的时候）；不可能想象出美国公司及其经济撤出生产率最高、劳动力最熟练、文化心理最相似、因而也获利最丰的欧洲投资区的情景。但是，另一方面，“美国的未来指向太平洋-亚洲地区”，在两极格局结束后美国必须把战略重点放在振兴国内产业、注重地缘经济、抢占科技“制高点”、分享亚太经济景气的目标上。说到底，“蝴蝶模式”证明了美国人一个根深蒂固的念头，即只有这个世界“大哥大”才有权利、有必要、有能力“领导世界”（并且“利益均沾”）。

在此构想下才有了美国的亚太战略新蓝图，它与美国的欧洲战略新设想是对应的，其轮廓大体有三根支柱：之一，在经济上，建立一个“开放”的“亚太经贸体系”或“亚太一体化框架”。所谓“开放”，是指对美国的开放；在建立这个体系时，须以 APEC（英文“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缩写）为主要舞台，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范本，换言之，新的亚太贸易体系应是北美贸易体系的扩大和延伸。美国坚决反对任何把它排斥在外的亚洲或西太平洋区域经济集团，不论这类集团以谁为核心、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之二，在安全上，建立一个“灵活而强大的地区安全结构”。其指导思想是，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由过去集中力量遏制苏联，转为在该地区起“地缘政治的平衡器”和“消除不稳定因素”的作用；本着精

^①关于美国的“蝴蝶模式”的思想最早由李慎之先生提出，笔者对此问题的思考受到与他的一次交谈的启发。另外，关于“美洲”一词的地理含义，可参见柳松的文章“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引发的关于‘北美洲’界定之争”，《拉丁美洲研究》1994年第2期。

兵、节支、高效的原则，逐步削减美国驻亚太的兵力，提高部队的质量和快速反应能力；维系原有的安全网络和双边盟约，要求日本等盟国共同承担防务责任和费用；探索维护亚太安全的新思路，建立“多边磋商机制”。之三，政治上，大力推动“亚洲国家民主化”趋势。其目的是消除目前亚太地区仍然存在的“反民主的”（例如人权问题）或“民主不完善的”现象，增强太平洋共同体国家的“共同价值观念”；美国在这方面负有主要责任的同时，要敦促日本等国共同作出努力（比如将政府开发援助同人权状况或控制军售联系起来）。①考虑到美国的实力，“蝴蝶模式”可能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是“太平洋文明”诸模式中较有影响的一种形式。

2. 日本的“雁型模式”

与美国不同，日本现在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充当“世界宪兵”的角色，对于这个位于太平洋西北部、面积只有 37 万平方公里的岛国，在即将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无论从政治、经济、安全哪个角度讲，都有理由在保持“西方一员”的同时，开始执行“脱美入亚”、开辟以日本为首的“环太平洋经济圈”的战略。政治上，日本看得很清楚，要想实现政治大国（如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等）的目标，必须立足亚洲、赢得周边国家的信任，“选票”首先应当来自于本国所在区域。经济上，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成长景气，是总体上萧条的世界经济结构内极难得的现象，美国、德国等西方大国都想借助它摆脱自身的“晦气”，对于资源缺乏、本国市场有限却占有“地利”的日本来说，更不能放过这种机会；再者，国际经济中区域集团化已是大势所趋，欧洲有共同体，北美有 NAFTA（英文“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缩写），亚太也应有自己的集团和组织，经济实力超群的日本当仁不让地要起“先锋模范作用”。安全上，在苏联威胁消失的情况下，美国对日本这艘“大航空母舰”的倚重减少，还会要求日本在地区防卫问题上承担更多的责任，而日本由于各方面的限制不能大力发展军备；借助未来可能建立的“亚太安全体系”或“亚太安全共同体”的形式，或许有助于解决这方面的难题：它既可以对其成员国施以一定约束，比如不诉诸武力解决地区争端、不违反有关武器销售的国际公约等，又能够允许日本为自己在地区安全保障事务方面发挥影响力找到“一个说法”。

上述考虑体现在日本政府公开申明的构想上，便是所谓“雁型战略”：与美国的亚太新战略有明显的不同，日本现在不希望或不便于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充当倡议人，而是积极主张这样一种“东亚经济圈”和“日本海经济区”，即：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呈现“雁型”发展梯次——日本排头，“四小龙”紧随其后，东盟国家为第三序列。在这一经济圈的基础上对外扩展，北面以“日本海经济区”（其主要内容是，俄国出资源、日本和韩国出资金技术、中国和朝鲜出劳力，开展以日本为主导的经济合作）为依托，辐射中国东北、南北朝鲜及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南面则以“印支大陆开发计划”为着眼点，辐射越南、老挝、柬埔寨和华南地区。这样有助于建立区域性的深度经济分工和合作，最终促进整个亚洲乃至太平洋地

① 参见哈枚：“美国的亚太新战略及政策调整”，《现代国际关系》1992年第2期；陈洁华：“克林顿总统提出新亚太构想”，《国际展望》1993年第14；罗伯特·奥克斯拉姆：“亚洲-太平洋的挑战”，美国《外交》季刊，Vol.72, No.1。

区的发展：“雁型模式”将加快产业结构的连锁式调整，形成日本生产高技术产品、“四小”生产一般技术产品和耐用消费品、东盟和中越等国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分工格局（当然各个层次的生产内容并非永远不变，而是由高到低不断外溢，每个层次隔一段时间就能上一个档次），各国相互依赖、“共存共荣”。^①“雁型战略”是日本的太平洋总战略中的基础战略，只有它取得进展，日本才有可能在亚太政治及安全事务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3. 马来西亚的“项链模式”

对于亚太合作和发展前途，美国是竭力想由自己主宰，日本则既想当头又不敢得罪美国，唯独马来西亚明确表示不欢迎美国人。在富有特色的强人马哈蒂尔总理的领导下，马来西亚经常以东盟或亚洲的发展中的独立国家代言人的面目出现，不断提出有别于他人的看法和建议。90年代初，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的倡议，构成“第三种模式”，其要点如下：集团成员以东亚地区各国为主，不包括美国和大洋洲国家；此集团目标在于促进区内贸易的发展，同关贸总协定的原则保持一致；适应区域集团化的趋势，加强东亚各国在乌拉圭回合范围内对其他国家集团的抗衡力量；作为一个组织，东亚经济集团将对“APEC 部长级会议”的功能起补充及促进作用；该集团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成立有共同利益的东亚国家的协调组织，第二阶段则建立旨在促进（太平洋区域内的）各国间贸易与投资的经济联系。针对美国的“相互依存说”，马来西亚领导人指出：“相互依存主要仍然是一种经济观念，对一大批弱小国家来说，没有什么现实意义。真正的相互依存不但意味着彼此之间相互依赖，而且有某种程度的平等和相互扶持的力量。”在马来西亚人看来，作为一个整体的东盟，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在联盟内部，国家相邻且一贯友好，地理和气候条件相似，经济发展基础和水平接近，共同利益甚多，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大到取得霸权的程度；至90年代初，东盟各国（不含文莱）国内生产总值达近三千亿美元，拥有三亿人口的消费市场和充足的劳动力，自然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如果很好地利用这一优势，由中小国家联手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将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太平洋经济圈的典范和雏型。^②

马来西亚所倡导的这种东西，我们姑且称作“项链模式”：首先，这是一个像形的说法，因为东盟所包括的六个国家（泰、新、马、菲、文莱和印尼）均处于北回归线以南和南纬10度以北的热带地区，各国都有大量的岛屿和湖泊，从地图上看，特别形似一串大小略有不等的珍珠项链；从发展趋势看，六国集团有可能扩大为九国或十国集团（加上印支三国等），这串项链将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延长。其次，“项链”之喻的关键之处在于合作伙伴的平等关系，这里没有“大脑”，也不需要“领头雁”，每个成员都是一颗珍珠，靠联盟这根线索串在一块，彼此有相互依存、同舟共济的利害关系。第三，“小的才是美好的”这一

^①参见张大林：“浅析日本的回归亚洲战略”，《国际问题研究》，1994年第1期；王亚军、高振营、姜波著：《21世纪：亚太风云际会》，第156-157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版；李健等著：《日本：21世纪再创奇迹？》，第154-158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版。

^②参见田忠卿、刘平、俞利军、张洪斌著：《东盟：亚太新星系》，第3章和第4章，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版；党大健、孙卫东著：《中国：面对亚太的挑战》，第130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版。

在 70-80 年代以后世界流行的经营哲学，亦可以在马来人的建议中得到体现，根据这种哲学，单元不在于大而在于有效，资源配置不在于规模而在于合理，同样，太平洋时代的到来不是出自大国的“魔术布”，而是源于诸如东盟已有的内部合作这样的扎扎实实的努力。尽管“项链模式”由于各种原因还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得到响应，它在思想理论上已构成对大国模式的真正挑战。

4. 中国的“扇形模式”

严格地讲，至今中国政府并没有宣布过任何关于中国对待亚太经济区或联盟组织的系统政策方针，不过，有几层考虑是众所周知的：第一，中国人强烈感受到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的八面来风，改革开放 15 年的经验和甜头也使中国的决策者愈来愈明确了加入这股大潮的决心；第二，欧共体相当成型，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已正式启动，惟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区划和组织形式尚不明朗，故中国既要积极也须慎重地推进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第三，鉴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多样性和经济发展水平及条件的层次性，亚太经济合作应当是形式多样的、灵活变通的、互通有无的，最好不要作出有约束力的硬性规定，不要向参加国施予这样或那样的压力；第四，中国绝不答应美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可能建立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或机构的企图，中国也不希望看到其他国家（比如日本）充当地区领袖或主导地区发展的做法；第五，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香港在 1997 年回归祖国以后将完全受中央政府管辖，因此任何可能使港台问题与亚太经济合作问题挂钩的企图都必然受到中国方面的坚决反对。^①

以上述考虑为基础，可以设想出中国对待亚洲-太平洋区域合作的战略方针，我们不妨冠以“扇形模式”的称谓：首先，中国将采取立足亚太、搞好周边、增强友谊、促进发展的方针，自己不称霸，也反对任何称霸的企图，包括处理亚太国家经济合作的事务。其次，“以我为主，灵活行事，可进可退，不受束缚”；中国一方面将对各种合作的邀请（如增长三角、小区域合作机构、自由贸易区、投资加工区等等）采取积极的态度，另一方面避免像马来西亚那样与美日等国正面交锋或摩擦。中国的这种灵活态度在中国领导人的下述声明中得到体现：“亚太地区的发展并没有靠集团，无论是经济集团还是政治集团，更不用说军事集团。靠的是开放和合作，靠的是取长补短、互通有无，靠的是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于这个看法，我们主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应当是这样一种开放的、灵活的、讲求实际的经济合作论坛和磋商机构，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机制化的经济集团。”^②再次，在地区合作问题上，中国将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东南亚一带，因为这一地区既是华人华侨集中的地区，也是中国同一些国家存在领土岛屿争端的地区；搞得不好，则有助于资源的流入（包括资金和技术，尤其是前者），弄不好，则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总之，对待亚太经济合作事务要像对待总的外交事务一样，抱定“冷静观察、沉着应付、不扛大旗、韬光养晦”的态

①（日本）山口正章：“华人经济圈的时代”，《编译参考》1993年第11期；党大健等，前引书。

②转引自李长久，前引文。另外，关于中国方面的一般战略考虑，可参阅下列文章：张海明，“我国参与亚太区域合作的‘切割式多层次作用’战略”，《亚太资料》第3期，1993年1月18日；潘锐，“中美关系史上重要的一页——中美首脑西雅图会晤及当前中美关系”，《国际展望》1993年第23期。

度。形象地看待这种立场，中国就像坐北朝南的扇轴，其东南方向面临的亚洲-太平洋区域为扇面，同这一区域大小不一的各个国家（及国家联盟）的联系好似一根根扇柄，古老的中国谋略就是摇动这把扇子的手。与其他模式相比，“扇形模式”目前仍是最低调的一种模式，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壮大，这方面的声音有可能逐渐提高。

五、差异：优势还是麻烦？

毫不夸张地讲，亚太地区是世界上差异性最强的地区之一，凡能在地球上找出来的几乎所有大的差异，都有可能在亚太地区发现。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好似一块用多种颜色、大小不一的马塞克板拼装起来的多面几何体。上面分析的几个主要国家的战略模式的不同，仅仅是这块几何体的一个方面。现在让我们讨论若干基本的差异，看看“太平洋纪元”的潜能及实现它的困难和障碍。

地理气候和自然资源方面的差异是一目了然的。亚太区域如果西至南亚半岛，东到美洲西海岸，北起美国的西雅图和日本的千岛群岛一线，南临新西兰的惠灵顿和智利的蒙特港一线，它占了东经75度、西经75度、北纬45度、南纬45度这样几乎半个地球；东西横跨15个时区，南北地处寒、温、热三带；自然地理极为复杂、多样。在这一大区的各国中，有的国家自然和矿物条件属于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行列，有的国家除了鸟粪、珊瑚之外别无资源；有的号称“千岛之国”，有的国家属内陆国（如老挝）；最大最小国家的面积之差有两千倍，最大最小国家的人口之比达一万比一；在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台湾、香港、日本、印度加尔各答等地，每平方公里上平均养活着好几百人，而全部密克罗尼西亚的数十万居民（不包括关岛在内）散居在约八百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

与自然条件相比，民族、文化、宗教的差异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有的国家新成立不到半个世纪，有的国家光文字记载的文明历史已长达五千年；有的民族近似部族，数万甚至数千人世代代偏于一隅，有的民族本身即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的大熔炉，活动范围伸及亚太乃至全球各个角落。文化的多样性在外人看来往往是难以理解的，例如，中国人和日本人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使用相同的方块文字，他们互相却听不懂对方的语言；菲律宾是亚洲的一员，华人在经济生活中有巨大的影响，但人们信奉天主教，议会里讲的是英语；印尼远离圣城麦加，可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教国家；人口已经达9亿之众的印度，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多元、种族混居、宗教复杂、语言各异、内部矛盾的世界，无论从规模还是内容都比亚洲以外的一些洲有过之而无不及；……。不那么精确地讲，以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为特征，在亚太地区存在五大文化圈（及其宗教）的并列与部分重迭：有的国家完全信奉一种文化宗教，更多的国家内部存在数种数十种文化（和亚文化）和宗教（及宗教派系）。美国著名亚洲问题专家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在分析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差别时所说的话，同样适用于整个亚太地区：“世界上很少有别的地区能比东南亚地区更鲜明地说明在千差万别之中求得一致所会遇到的各种问题。各个种族的代表性的特点、文化类型、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纷繁杂陈，其种类之多、范围之广，几乎囊括人类所见识过的全部类型。在这个地区的将近三亿人当中，全世界的主要宗

教大部分都有其代表，许多伟大的文化也有其代表。同时，在内地的山区和丛林里分布着一些从昔日一直留传到 20 世纪的最原始的部族。这不仅仅是两种极端的同时并存。在现代社会的人和石器时代的人之间存在着无数的层次。而且，在文化上多种多样的同时，经济上却存在着相当严格的等级制度。”^①

最严重的差异或许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欧洲东南部与西北部之间，非洲不同区域之间，南北美洲之间，都存在社会经济比较发达同比较不发达的距离，但它们无论如何没有亚太地区这方面的内部差异之多之巨：在这里，我们起码能够看出五到六个不同的发展层次：最上面一层是美国和日本，它们也属于世界上总产值及人均产值最高的国家之列。第二层有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为中等发达国家。位居次一层的是那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及地区），最有名的是“四小龙”；再往下是东南亚各国，即为开始起飞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越南和印度紧随其后，人均产值更低，故也可算作另一个层次；最后是孟加拉国、缅甸等国，属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规定的“特别贫困的国家”。单就国家整体的 GNP 数值而言，贫富差距已达一百倍：最穷的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不足三百美元，最富的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超过三万美元！数字远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因为它们没有可能告诉你诸如道路的状况、饮水的质量、医生的多寡、教育的普及程度、科技的创新能力和产业的结构合理性等等情况；倘若能从综合国力角度作精确分析，亚太地区经济最强大国家与最弱小国家之间的差距又何止一千倍、一万倍。

最后，当然不应忽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与对立。尽管随着苏联的消失，国际关系中的东西方矛盾相对有所缓解，但是，没有人否认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之间、在许多问题（比方讲人权、堕胎、信息的控制、政府的作用等）上的“西方”价值观与“东方”价值观之间，仍然存在尖锐、深刻、长期的分歧和冲突；这种分歧和冲突在世界别的地区也时有发生，可是像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这样以广泛、持久的非暴力对抗的形式出现的情况却极为罕见。如同人们见到的那样，在亚太地区，这种对抗并没有采取打仗或者“冷战”的形式，而是经常表现为难以平息的外交争吵、经济贸易的报复、科技领域的封锁、偶尔还有军事方面的威胁等等。在这一地区，有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有最大的伊斯兰教国家和最大的“自由主义堡垒”，有目前世界上最坚定的计划经济国家和最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在有的国家，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而在另外有些国家，共产主义宣传被视为非法；在有的国家内部各种“主义”和政治派别奇妙地“和平共处”，也有些国家内部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形同水火；有的国家同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有的国家差不多完全使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离。

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上述极复杂的差异，带来的结果是好是坏？或者说，造成的是优势还是麻烦？分析表明，两种可能兼而有之，关键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它们。

差异存在的最大好处，是使亚太地区各国之间有极大的互补性。互补性首先当然是经济、贸易的互补性。有的国家劳动力充裕而资金缺少，有的国家人手紧缺而资本雄厚；有的国家人多地少矿物资源缺乏，有的国家人少地多物产丰富；有的国家人口结构老化，有

^①斯卡拉皮诺著：《亚洲及其前途》，第18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的国家青壮年占绝大多数；有的国家偏重农业，有的国家有现代化的工业，……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总之，经济上互补的需要是亚太国家走向合作的第一要素。互补性也可以表现在文化、思想方面。让我们列举一个浅显的事例：“现代日本社会在服装文化方面，既可以看见笔挺、庄重的西装和各种流行的摩登时装，同时又又可以见到以中国古代服装为摹本的日本传统和服；在饮食文化方面，（日本）既有西式餐厅，也有日本式的菜馆，同时还有高挂着中华料理招牌的中国式饭店，甚至在一个酒店里既有威士忌、西洋葡萄酒等洋酒，也有清酒等日本酒，还有茅台、绍兴老酒等中国酒。”¹“在现代日本民族中，佛教、基督教和日本神道长期并存。这些宗教在世界其他一些地方可能彼此对立、互不相容，但在日本则可相安无事、各得其所。在一个城市里，佛教的寺院、基督教的教堂、神道教的神社，鼎足而立。许多日本人居然一个人同时信两种以上的宗教！人们常常是刚刚在佛教的寺院里拜过佛，转过身来又到附近的神社里去敬神。”²从日本人的行为规范和思想内容中，不难发现多种文化渊源的交融。

差异更有可能造成杂交优势。这是生物学教给我们的一个基本原理，它亦适用于分析亚太地区蕴藏的巨大潜能。由于这一区域的民族、种族、文化、宗教、经济、社会之发展的多样性，原则上讲，它们的组合方式应当比其他地区多得多，而且，即便有时杂交也会生成劣种，但更多的情况下可能产生更好的品种。举一个例子。一度曾经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东方人不易进入现代化，起码文字上就不像西文那么好学好用，文字的复杂无形中增加了——譬如说——改进计算机技术（一般都把计算机看成是欧美人的发明）的难度。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已使这种判断失灵。原因何在呢？根据一位语言学家对笔者的谈话，比较难写的文字却有着较高的辨识能力和抗干扰性，熟悉这种语言的计算机专家能够开发出比使用西文字母时性能更优越的软件。日语中由于使用汉字（表意文字）、平假名、片假名和罗马拼音这些“丰富的文字”，韩国人由于使用汉字、朝鲜字母和罗马字母的组合体，已经令这两个国家在计算机语言上走到了世界先进行列；目前华语区也正在显示类似的景象。很显然，到下一个世纪，主要的科技制高点将是与人类的创造性联系在一起的信息技术（如微电子技术、生物遗传密码技术、航空航天技术、军事制导技术等等），构成其中心和基础的仍然是计算机和模糊理论（后者的作用恰恰在于识别和组合各种“边缘性”的技术及其功能），而在这方面，语言本身的丰富程度可能成为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之一。当然，潜能不等于现实力，能否将其开发出来，还要看其他因素是否具备，如体制因素、环境因素、资金因素、人员因素等等，但联系到本文的主题，我们至少可以说，亚洲-太平洋区域的各方面的极其多样性，为创造新的、更美好的前景提供了天然有利的条件，所谓“太平洋文明”或（“太平洋时代”）有可能取代“大西洋文明”（或“大西洋时代”）的命题也正是因为考虑到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差异同样可能带来麻烦。首先，像许多专家指出的那样，社会制度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分歧、历史上文化上或种族方面的隔阂，使亚太地区至少短期内难以形成欧共体或北美自由贸易区那样的政府间协议，一体化进程肯定比后两者要慢得多；事实

¹ 王亚军等，前引书，第120—121页。

上，这一地区有很多国家根本否认一体化的必要性。我们在这里讲的“一体化”，并不等于“大一统”，而是指深度的分工与合作。一体化的程度，直接决定着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比如，越南急欲加入东盟，可后者出于某些考虑而表现出犹豫的立场，这从单纯经济角度显然是说不过去的；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蒙古和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对图们江流域的共同开发，遇到了生活习惯、工作效率、法律准则、利害考虑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差别的妨碍，这一类差别在西欧自然不会如此严重；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世仇和现实矛盾，给南亚次大陆的次区域合作蒙上了一层阴影，本来这一区域有着极有利的自然条件；即便在今日政治上经济上共性很多的东盟地区，由于各国曾经分别属于美、英、日、荷等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也造成了各国对外经济政策方面的差别并进而多少影响到各国之间双边或多边关系的发展；……。诸如此类的情况还可以列举不少，尽管它们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从根本上排除“太平洋时代”实现的机会，却给这一时代的到来增加了不少障碍。

其次，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利益、地理位置和实力不平等状况，这一地区快速的、同时又是极不平衡的经济发展，也造成了太快的变化和太多的变量，往往使昨日的朋友变成今日的敌手，或者反过来，令昨日的对头变成今日的朋友。例如，从前日本和韩国由于苏联的存在而相当团结，现在这两个国家却由于朝鲜核问题出现了分歧，也许明天它们会由于彼此间的海域划界而争吵；中国和越南在两极时期曾经历了从“同志”到“敌人”的剧变，这两个国家在冷战结束后又经历了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南中国海在战后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很长一段时间曾经一直风平浪静，而今天当两大军事集团一个消失一个后缩的时候这一带洋面下却酝酿着冲突的海啸；美日之间一向互称“伙伴关系”（虽然是领导和被领导的“伙伴关系”），可眼下日本人越来越强硬地说出了“不！”字，新出版的《下一次美日战争》在美国立即成为畅销书；就在世界多数地区出现裁减军备的态势的同时，整个东亚地区从朝鲜半岛到东南亚地区直至南亚次大陆均出现了所谓“逆裁军”现象（当然，对有些国家来说，它只不过是随着经济的现代化而必然推进的国防事业现代化的正常现象，但对于相当数量的国家而言，它更是对冷战结束后敌我友界限模糊、传统的安全保障失效的一种本能的反应）；在总的局势仍然相对稳定、经济保持增长势头的同时，人们不能断然排除个别纠纷的长期存在和潜在冲突爆发的可能……。与西欧或北美相比，这种不稳定性 and 不确定性或多或少降低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太平洋区域的力量和在世界事务中的发言权，威胁到前面预测的“太平洋文明”成长发育的前景。当然，像前述优势的未充分开发性一样，这里讨论的麻烦亦不完全是现实化的；在没有被外部或内部因素激发之前，它们多半不占据人们关注的焦点；即便已经变成了现实，也不一定充当占主导地位的事实。我们应当谨慎地把握好此处彼处转换的“度”。

无论优势或者麻烦，本文都仅仅是在进行一种推导；“太平洋时代”的到来，归根结底要看有关国家的实际努力。在推动新时代到来时，面对深刻复杂的差异和矛盾，必须摒弃的一种认识是，文明中心的更迭，只能表现为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过程，比如，要么“西风压倒东风”、要么“东风压倒西风”，不是大西洋区域的霸权，就是太平洋地区的主宰，“我受够了欺负，现在轮到我统治你了”。也许曾经有过这种局面，也许那时不由得不是这种局面，像 3500 年前的法老王吐特摩斯三世以持续的对外侵略和军事掠夺、建立起

古埃及历史上最强大的军事帝国时，或如 250 年前英国舰队赢得重大海战、为不列颠帝国的全球霸权奠定基础时；然而，即将进入 21 世纪的进步人类，事实上不会赞成、也不应当抱有类似的态度。尽管存在现实中的强权政治和个别国家的支配心理，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所谓“太平洋时代”形成的关键，在于亚太这一拥有全人类近半数的区域对其他地区的借鉴、吸收和创新的能力，在于这一拥有种族和文化多样性的区域之减少纠纷、避免冲突、利用“杂交优势”和向“高边疆”不断开拓的自我调整、自我提升的能力，总之，在于它的博采东西、贯通古今、“争”中求“和”、以“和”融“争”的整合力。¹虽然这里讲的东西尚属一种与现实有距离的理念，实现之还需要克服重重困难，它对于指导人们正确理解当今世界表面动荡浑浊的潮汐下的主流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新世纪的要求，是各国加速进入已渐趋明朗的全球化进程的必然，也是“太平洋时代”之说立论的基石。撇开或背离这一视角，我们的论题便失却了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上海市太平洋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会成立

上海市太平洋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会于 1994 年 5 月 21 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成立大会，著名学者谢希德、严东生、郑立志、罗小未等各界人士 140 余人出席会议，上海社联副主席林炳秋、原上海科协主席、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翁史烈等到会祝贺。中国太平洋学会副会长张海峰专程由北京来沪代表周谷城、于光远先生和中国太平洋学会祝贺研究会成立。会上还举行了“迎接太平洋时代到来”的学术报告会。

上海市太平洋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会是研究太平洋区域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以及企业家自愿结合的群众性学术团体，是上海市社联的团体会员。研究会的宗旨是团结上海地区以及海内外的学者和企业家，开展以太平洋区域经济为中心，兼及科技和社会发展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把上海放到太平洋区域这一国际大环境中去考察，开展上海地区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近、远期的战略决策研究。

研究会选举谢希德为名誉会长，袁随善为会长，乐美龙、朱继懋、庞锡昌、金桂青、袁运开、潘名山为副会长。辛元欧为秘书长。

（辛元欧稿，1994 年 6 月 17 日）

¹ 关于新时代所要求的“和”而非“争”的精神，李慎之先生的大作《开展全球化研究》有十分精辟的阐述。见《世界知识》1994 年第 2 期。